

经济因素与民主化绩效关系考证

——关于巴西、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的实证比较

王庆兵

(平原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所,河南 新乡 453003)

摘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面临着民主化的发展。无疑,经济发展状况同民主化绩效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突出问题。本文以巴西、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三个国家的实际状况为案例,通过比较分析探讨了经济因素与民主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现代化;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K73,K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2-0169-06

本文所谓民主化绩效是指两个方面含义:首先指在推行民主化的过程中民主政体是否得以连续存在;其次是指实施民主化能否将社会冲突与共识整合在良性循环范围之内。影响民主化绩效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但是这些因素与民主化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关键决定因素,实际上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已经被充分论证的传统权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可以为政治民主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而且经济自由化必然是政治民主化的根本动力源泉;同时,政治民主化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仅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而且作为对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够推动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种标准的假定应用于自然渐进的发达国家更加具有解释力,而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历史阶段性等多因素的作用,并不能表明都符合这种理论假定。比较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这三个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情况,甚至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一、经济发展之于民主化

经济发展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西方民主政治与西方发达的工业化相称的水平似乎自然证明了经济在民主进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李普塞特认为:“把政治体系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

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政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1]27} 亨廷顿也从经济上论证与民主的相关性,提出了能否支撑民主化的经济数据,他认为,如果在70年代中期有一位社会学家想要预测民主化的前景,只要扳一扳手指,算一算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度地带的国家就能预测得很成功。尽管如此,亨廷顿并不认为民主化完全由经济发展决定^{[2]72}。从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的事实可以证明,经济发展虽然的确与民主化有相关性,但并非全部是正相关关系,而是一种离散式的关系。

由此,我们需要考察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三国经济发展相对最快的时期民主化的进展情况。巴西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是20世纪60至70年代,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巴西现代化的飞跃阶段——巴西经济奇迹。巴西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人均GNP从1960年的118美元增加到1982

* 收稿日期:2006-04-24

作者简介:王庆兵(1966-),男,河南林州人,平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比较政治学。

年的 2240 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60 年到 1982 年年增长率为 4.8%；城市人口从 1960 年占总人口的 45% 上升到 1982 年的 69%；中学入学学生数占本年龄组人口的百分比从 1960 年的 24% 上升为 1981 年的 57%；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 20~24 岁人口的百分比从 1960 年的 4% 上升到 1981 年的 13%。然而，从民主化进程来看，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正是巴西军人专制的时期，这一时期内，巴西军人从干预政治的后台直接走上了执政的前台。1964 年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亲自执掌巴西政权，巴西进入了长达 21 年的军人专制统治时期。军人实行高度的集权统治，1964 年到 1969 年间颁布了 16 个制度法、77 个补充法和宪法修正案，总统拥有一切权力，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权力大大弱化，总统不仅有权解散议会，还有权中止或取消那些被认为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的政治权利。州长和市长均由军政府选定，取消一切政党，人为地制造了两个法定政党：一个是所谓的法定“执政党”——全国革命联盟，一个是所谓的法定“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这两个党实际上是对军政府言听计从的附庸和工具。军政府禁止任何言论自由，实行新的新闻检查制度，严格控制工会和劳工组织。事实上，这正是巴西经济现代化奇迹产生的直接背景。尤其是 1968—1973 年之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高达 10.1% 以上，同期，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 10%。这两个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3]102-103}。在工业化程度方面，1968 年至 1973 年五年间钢材、铁矿砂、水泥、汽车分别增加了 1.7 倍、2.8 倍、2.4 倍、3.6 倍；这五年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20% 之内。相反，1981 年、1982 年、1983 年的 GDP 增长率仅仅分别为 1.9%、1.2%、3.3%。财政赤字增加，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低经济增长率、低投资率、高通货膨胀率、外资流入率下降、各种稳定计划失败”成为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巴西状况的基本特征^{[3]115}。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恶化的经济形势下军人专制政权开始出现了民主的松动。1979 年 4 月军政权取消对新闻、书籍、电影、戏剧和各种出版物的检查制度，8 月赦免了 1.5 万名因政治问题而受迫害的人，11 月颁布了《政党组织法》，解散了军政权一手制造的两党制，允许自由组织政党，决定实行多党制；1982 年，巴西举行了自 1964 年政变以后的第一次州长、市长和联邦、州、市议会的直接选举。

委内瑞拉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时期是 60 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从 1960 年的 630 美元增加到 1970 年的 943 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及农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 70 年代，分别是 70 年代的 1.5 倍、1.9 倍、1.9 倍、1.4 倍。同期城市人口增长率是 70 年代的 1.2 倍。相比较而言，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为政治民主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基本环境，1961 年公布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委内瑞拉共和国永远是民主的、代议制的、责任制的和轮换制的政府”，总统不能连任，“共和国的总统通过直接的普选产生”，“共和国总统任期届满后的 10 年内不得重新当选总统”。宪法规定委内瑞拉实行多党制，规定“所有有选举权的委内瑞拉人有权参加政党，以便通过民主途径参与对国家政策的指导”，“立法人员必须使政党的建立及其活动合法化，以确保政党的民主和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4]366}。但是，在对待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左派力量问题上，民主显然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在反对希门尼斯专制的斗争中，委内瑞拉共产党作出了重要贡献，执政的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也曾经同委内瑞拉共产党进行过合作，但是在签定菲霍角协议时，委内瑞拉共产党却被排斥在外。1961 年 1 月，委内瑞拉政府下令停止宪法保证，封闭左派报刊，禁止罢工、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尽管这些违反宪法的行为受古巴革命后形势的影响，但是，委内瑞拉经济发展并未对民主化的进程产生直接的决定作用。

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状况与巴西和委内瑞拉相比，在整体水平上低于后者，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拉美与非洲经济状况相比在整体水平上的特征。但是从一个国家的纵向发展过程来看，尼日利亚经济在战后也有明显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在 20 世纪 70 年代呈现出好于其他时期的特征，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尼日利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尤其是 60 年代后期开始发掘的石油资源所带来的滚滚石油美元，曾经带动了尼日利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所谓‘黑非洲经济奇迹’”^{[5]195}。从 1958 年到 1970 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 2.7 倍；60 年代的通货膨胀率比 70 年代低 10 个百分点；尼日利亚在 60 年代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在 70 年代进一步得到增长，甚至 60 年代农业和工业的增长速度则还分别超过了 70 年代的增长速度。70 年代中期是欧佩克组织所带来的石油繁荣时期，尼日利亚的石油收

入十分可观,以平均每年 30%的速度递增,从 40 亿美元增至 1980 年的年平均 250 亿美元;经过 70 年代的发展,尼日利亚城市人口由 60 年代占总人口的 13% 上升为 21%,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由 60 年代的 4.7% 上升为 4.9%,50 万人以上的城市数由 2 个增加到 9 个。但是,石油美元收入的增加以及工业化、城市化似乎并没有对尼日利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相反,地区矛盾、部族隔阂、政党之争、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军事政变、军人统治成为尼日利亚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甚至石油收入的增加成为比拉夫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1966 年军事政变后上台的戈翁军政府统治尼日利亚将近 10 年,虽然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采取了坚决反对国家分裂的措施,但是严重的部族主义和部族矛盾冲突依然时刻威胁着政治稳定,而有效的民主化进程无法得到扎实的实施。1975 年同样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穆罕默德军政府虽然提出了“还政于民”计划,但是仅仅一年后即被军事政变所推翻。而这次政变后执政的奥桑乔军政府实施了还政于民计划,很明显不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因此,“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1]35}。

二、民主化之于经济发展

民主化是社会政治对经济的反映,但是排除民主化运行的特殊规律,而简约化地认为民主化必然推动经济的发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得不到验证的。由此,需要将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民主化进程中较成功阶段的经济形势作一比较。

1945 年 10 月,独裁执政 8 年的瓦加斯被赶下台,标志巴西进入 18 年的民主试验阶段。1945 年 12 月进行了巴西历史上较为自由的一次选举。制定并颁布了 1946 年宪法,恢复三权分立制度,规定立法权归议会行使,行政权主要由总统行使,宪法重申,巴西实行联邦制,规定各州拥有自己的宪法、州议会和以直选形式产生的州长为首的州政府。三个主要政党活跃在巴西政治舞台上,从 1945 年开始,巴西出现全国民主联盟(UDN)、社会民主党(PSD)和巴西劳工党(PTB)。全国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主要支持者都是中产阶级,区别在于全国民主联盟主要是反对瓦加斯力量的联盟;巴西劳工党主要支持者是城市工人阶级^{[6]123}。1964 年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亲自执掌巴西政权,巴西进入了长达 21 年的军人专制统治时期。1985

年巴西军人专制统治出现政治松动,3 月 14 日的大选中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获得胜利,标志 21 年的军人专制结束,新的民主化开始。这个时期,制定了宪法修正案,恢复了总统、州长、市长直接选举制,取消了选举人团制;给予 18 岁以上的文盲选举权;恢复自由组建政党原则;巴西政党很快由 5 大党增加到 20 个政党。1988 年,巴西制定并颁布了宪法,确定实行总统制,总统任期五年;总统、州长、市长直接选举制载入新宪法;恢复议会立法和决策机关的地位,给予 16 岁以上的公民选举权。因此巴西民主化进展较好的时期分别是 4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以后两个阶段。尤其是进入 80 年代以后,巴西民主化进程速度明显加快。

从经济发展来看,1993 年巴西工业、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 37% 和 20%,低于 1970 年的水平;从 1970 年到 1980 年,巴西 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 8.1%,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 9.4%、9.0%、7.8%,而 1980 年到 1993 年 GDP 平均年增长率为 2.1%,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增长率分别仅为 0.7%、0.2%、3.3%^{[7]219-279},虽然基数的不同影响增长的速度,但是增长速度之慢显然不能证明民主化的进程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从城市化来看,城市化又称都市化或城镇化,包含三个层面的扩散:一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多,城镇人口逐步增加,而农村人口相应缩减。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中的比重此消彼长。二是城镇布局由分散孤立状态逐渐演化为彼此密切相连的有机系统。三是城市生活方式向乡村地区扩散和辐射,是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并向城市生活方式看齐。一般说来,世界城市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或水平: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 20% 以内,是缓慢发展阶段;20%~70% 之间为加速发展阶段;70% 以上为平稳发展阶段^{[3]248}。实际上,上述三个阶段反映了城市化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水平,即初级水平的城市化、中等水平的城市化、高水平的城市化。巴西城市化的三个阶段表明,巴西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第二阶段,从占总人口的 25% 上升到 70% 花了 70 年时间,相比之下,英国用了 90 年,法国用了 120 年,美国则也用了 90 年^{[3]262}。但是,在具体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上,巴西 70 年代年均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为 4.1%,高于 80 年代的 2.5%。

二战以后委内瑞拉民主化相对于巴西而言进展更快一些。除了 1948 年至 1958 年希门尼斯的 10 年独裁统治外,基本上民主化处于连续状态。在希门尼斯统治时期,委内瑞拉经济有一定的发

展,1945—1957年农业年平均增长率达4%。1950—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在9%以上,195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45年增加两倍^{[4]359}。1958年希门尼斯政府垮台后,委内瑞拉建立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但是,正如巴西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与民主化高度发展时期并非表现为一致性一样,委内瑞拉民主化进展程度也并非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相一致。1981年到1985年,委内瑞拉在民主化进展顺利的情况下,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88年美元计算)由3944美元下降为3351美元,增长率为-4.2%,债务危机、结构调整以及各项改革政策都对经济形势产生巨大影响^{[8]463}。整个80年代,除工业年平均增长率由0.5%增加到2.1%之外,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农业年平均增长率、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以及服务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下降了2%、0.6%、4.4%和5.4%^{[9]238-241}。

尼日利亚自1960年10月1日独立后,在民主化进程中经历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第一共和国是在殖民地基础上独立后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则是1999年军人还政成功后建立的,第二共和国是在1979年军政府还政于民后建立的。因此,分析尼日利亚民主政治发展对经济的相关性以第二共和国较为典型。1979年10月1日,在庆祝尼日利亚独立和建国19周年之际,奥桑巴乔军政府在首都拉各斯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还政于民政权交接仪式,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成立,民选文官总统沙加里宣誓就职。这次还政于民的成功选举,标志着尼日利亚民主政治在经历了15年的军人执政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通过民选上台的沙加里文官政府,在其后来的执政中却显示是一个脆弱、无能和腐败的文官政府,实际上无力应对它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在这个时期,尼日利亚经济形势恶化,尽管有石油市场波动的因素导致国家经济困难,但是政府在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措施证明这届文官民选政府作为民主化成果未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缓慢、石油财税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政府仍制定了一个宏大的依靠石油收入支撑的投资计划,而在石油价格下跌财政紧张时政府采取的严厉激进措施进一步导致民众的普遍贫困化。更为严重的是,民主化成果并未建立起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第二共和国时期政府控制的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的官员,与商人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和批准进出口许可证时大肆收取回扣,造成了严重的腐败风气,加剧了经济的恶化和社会动荡,为第二共

国的失败埋下了重要隐患。由此可见,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并未能够直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仍然是离散性相关关系。

三、威权统治与经济发展

威权统治是政治民主化的对立产物。从权威理论上来看,威权与经济发展是不相容的,而民主化则是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但是,上文从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民主政治在一定情况之下并非与经济发展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同时,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的事实仍可以证明,集权甚至专制政权并非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崩溃。

巴西典型的事实说明军人政府在创造“经济奇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64年至1985年期间,巴西军人在政变基础上建立了长达21年的集权统治。这个时期的政府均由四星将领导,由军官、技术官僚和老资格的政治家组成。虽然军政府保留着宪法和总统选举,但是这些制度化的形式在实质上已经远远背离了民主化的轨道。1964—1969年间政府颁布了16个制度法、77个补充法和宪法修正案,总统权力集中,而立法、司法权力大大削弱。总统不仅有权解散议会,而且有权在危机时刻宣布180天的戒严,有权中止被认为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的政治权利。州长、市长由军政府选定,军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压制政治多元化,取消一切政党,人为制造两个法定政党,禁止言论自由,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排斥民主化进程的军政府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个时期,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巴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罕见;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工业体系逐渐完备;出口品种增加,出口产值明显增长,外汇储备猛增;通货膨胀率低且稳定下降。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被誉为“第三世界的领头羊”^{[10]159}。正如人们早已对东亚模式总结的那样,军人执政创造的经济奇迹直接说明权威统治并非总是与经济恶化和崩溃相关联,同时证明经济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存在一定程度的离散性。

相对来讲,委内瑞拉的专制统治时间比巴西要短。1948年,希门尼斯依靠政变掌握了政权,直至1958年被新的政变所推翻,建立了长达10年的专制独裁统治。军政府下令解散了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和委内瑞拉共产党,关押和逮捕了大批民主人士,在议会选举中弄虚作假、私改选票,甚至监

禁参加竞选的总统候选人。1953年4月,希门尼斯召开没有党派参加的制宪会议,通过所谓的新宪法,宣布自己为1953—1958年的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然而,希门尼斯专制统治时期,委内瑞拉的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外国投资由1945年的7.38亿美元上升到1956年的37.1亿美元;石油工业发展速度很快,非精炼石油的生产从1945年的1080万吨增加到1956年11440万吨。同期石油出口收入增长了6倍,大型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发展迅速;1945—1957年间农业年均增长率达4%,1950—1957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在9%以上,195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45年增加了2倍^{[4]359}。事实说明,委内瑞拉在仅有的10年希门尼斯独裁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非民主化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再一次建立了直接的相关关系。

同一时期内,尼日利亚的专制统治时间比巴西和委内瑞拉要多,这似乎可以证明尼日利亚落后的经济与非民主化政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前文已经论述过,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并非出现在短暂的第二共和国时期,而1999年建立的第三共和国经济成效尚处于考验之中。由此说明,三十多年的军人专制是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尼日利亚1965—1988年的人均GNP年平均增长率为0.9%,1988年人均GNP为290美元;1965年到1980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3.1%,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4.6%,服务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6%,而相比之下,80年到88年之间,相应的增长率分别是-3.2%、-2.9%、-0.4%^{[11]178-180}。1982年尼日利亚人均GNP达860美元,1960—1982年人均GNP年平均增长率为3.3%,60年代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7%,70年代则下降为4.8%,但是,60年代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9.1%,70年代则上升为12.0%。1990年尼日利亚人均GNP为290美元,1965年到199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0.1%。1965年到1980年间,尼日利亚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0%,而1980到1990年间则下降为1.4%;1965年到1980年间工业、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13.1%和14.6%,但是在1980到1990年间则分别下降为-1.2%和-1.0%^{[12]218-220}。1993年尼日利亚人均GNP为300美元,1980到199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0.1%;1970到1980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6%,而1980到1993年间则下降为2.7%,相对

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则由7.3%下降为0.8%^{[13]238-241}。1984年尼日利亚人均GNP达730美元,1965到1984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2.8%。1965年到1973年之间GDP年平均增长率达9.7%,而1973到1984年间则下降为0.7%,相应的工业和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由19.7%和15%下降为-1.0%和8.5%^{[14]180-182}。由以上统计资料可见,尼日利亚整个建国以后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这应该能够证明长期的专制统治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时,分析数据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假定的那样准确,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是相对比较快的,这自然与当时的世界性石油经济上升的形势有紧密关联性,而且随着世界石油市场的波动,尼日利亚经济进入了严重的低速度甚至较长时期的负增长阶段。比如,1965年到1973年之间尼日利亚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7%,而1973年到1984年间则猛然下降为0.7%,相应的工业和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由19.7%和15%迅速下降为-1.0%和8.5%。这些似乎可以证明经济发展状况主要与经济发展内在与外在特殊规律相关,尼日利亚在黑非洲所经历的经济奇迹的出现与消失再一次说明,民主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并非如权威理论所假定那样直接和完全匹配。正如李普塞特所言:“在任何一个既存的社会,一方面是收入、教育和宗教一类事情,另一方面是民主,两方面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甚至在理论领域不应提前考虑的原因在于:就社会的政治子系统的自运动而论,一种政治形式可以在完全不利于它出现的条件下持续存在。换句话说,一种政治形式之所以可以建立,是因为同时存在一系列独特的历史因素,即使社会的主要特征有利于另一种政治形式。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有利于建立民主制,但一系列不利的历史事件,使民主形式得不到合法性,因而削弱了这个国家对付危机的能力。”^{[1]25}

由上述论证可见,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并非都是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不一定直接导致政治民主化进程,威权政权甚至专制政权并不一定导致经济的停滞或崩溃;相反的情况也大量存在,民主化进程有时反而是在经济停滞甚至恶化的情况下取得一些进展。当然,这种证明并非要完全否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绩效之间关联性,更不是证明了专制或威权体制必然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不是本文讨论的目标;本文所关注的是在一些发

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化过程中,经济因素并非是直接的关键变量,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离散性,民主化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它受多变量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不同构成或不同的出现次序都会使民主化发展呈现为不同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 [1]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 张绍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2] (美)塞缪尔·P·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3] 吴红英. 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 [4] 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 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5] 刘鸿武等. 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 [6] Howard J. Wiarda, Harvey F. Kline. An Introduction To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M]. Westview press. 2001.

- [7] 世界银行 1992 年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
- [8] (英)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 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M]. 张凡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 [9] 世界银行 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
- [10] Riordan Roett. BRAZIL-Politics in Patrimonial Society[M]. Westport. 1992.
- [11] 世界银行 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 [12] 世界银行 1984 年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
- [13] 世界银行 1995 年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 [14] 世界银行 1986 年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张颖超

Analysi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Performance; Brazil, Venezuela and Nigeria

WANG Qing-b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Pingyuan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3,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alway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democratization while going toward the modernization. It is clear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performance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academe for many year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giv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Brazil, Venezuela and Nigeria so as to discus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Brazil; Venezuela; Nigeria;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